



鄭振鐸評傳

金梅 朱文華

百花文艺出版社

鄭振鐸評傳
PDG

郑振铎评传

金梅 朱文华



百花文艺出版社

[津]新登字(90)002号

郑振铎评传

金梅 朱文华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赤峰道130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0 5/8 插页2 字数232000

1992年2月第1版 1992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200

ISBN7-5306-0676-X/I·594

定价: 6.95元

关于京本通俗小说的版本问题

鄭振鐸

長澤規矩也。看他的體裁，他自註所著的《張本通譜》小記其凌本山
體裁有以可資討論的見解。我因凌生君斯正之評公刊于本
報，長澤君以為他較長之中，說現在不通譜小記並不是（宋本）
但其中的小記卻確是宋人之作。葉德輝所稱的影鈔宋刻本（金唐）
偽後王景濤卷，其未處卻更可疑。又在明之前，彷彿像宋本四
傳小記那末大部的小記數刻也是很難產生的。對於這些話，飲是
表示充分的同情的。但長澤君除了決定葉刻的定本為清王景濤
是偽冒之外，其他（宋本）或（明本）並因有下過什麼確定的跡
象。今姑就我所知，（宋本）而為他解釋了幾個疑問。或者對於宋
本通譜小記的跋本問題與時代問題，可以（下）確定吧。（明本）

目 录

第一章 怎样走上人生的道路 (1898—1920)	1
一 家庭和身世	2
二 从温州到北京	4
三 置身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热潮中	10
1. 热忱介绍俄国文学	11
2. 接受五四爱国运动的战斗洗礼	14
3. 宣传理想的“新社会”	18
4. “人道”的困惑与求索	25
第二章 新文学运动的杰出组织者 (1920—1927)	31
一 发起组织文学研究会	32
二 致力于新文学建设事业	38
1. 出色的文学编辑活动	38
2. 倡导儿童文学	45
3. 进一步介绍外国文学	51
三 文学思想和文学论争	66
1. 文学理论的独创性	66
2. 对“鸳鸯蝴蝶派”和“学衡派”的斗争	71
3. 与创造社的笔墨相讥	77

四 文学创作的成就.....	81
1. 《雪朝》诗集及其他.....	84
2. 短篇小说集《家庭的故事》	92
五 文学研究的发端.....	100
1. 对文学研究工作的理论认识.....	101
2. 文学研究的第一茬收获	107
六 投身于社会革命的洪流.....	117
1. “五卅”运动和《公理日报》	118
2. 大革命失败前后.....	126
第三章 未入盟的左翼作家（1927—1937）	131
一 欧洲来去.....	132
1. 从巴黎到伦敦.....	132
2. 归国后的生活足迹.....	138
二 左翼作家的本色.....	140
1. 一场独立的反抗战.....	141
2. 战斗在“左联”门外.....	146
3. 与鲁迅的关系	154
4. 在抗日救亡运动中.....	161
三 中国现代出版史上的“两大工程”	166
1. 协助编辑《中国新文学大系》	167
2. 主编《世界文库》	172
四 文学研究的新收获.....	177
1. 《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和《中国俗文学史》	177
2. 《中国文学论集》及其他	187
五 历史小说创作的成就.....	193
1. 《取火者的逮捕》	193

2. 《桂公塘》及其他.....	200
第四章 坚贞的爱国主义文化战士（1937—1945）.....	211
一 吹起抗日的战号.....	212
二 战斗在“孤岛”.....	218
1. 面对险恶的环境.....	218
2. 抢救民族文化典籍.....	223
三 不寻常的蛰居生活.....	236
1. “最后一课”前后.....	236
2. 保全和整理民族文献.....	241
第五章 坚定的民主斗士（1945—1949）.....	247
一 加入民主运动的行列.....	247
二 天亮以前的工作.....	254
1. 主编《文艺复兴》和《文学周刊》.....	255
2. 编印《中国历史参考图谱》及其他.....	258
三 在迎接新中国的日子里.....	267
1. 由共产党接了解放区.....	267
2. 参加几个重要的大会.....	271
第六章 新中国文化事业任劳任怨的开拓者（1949—1958）	
.....	274
一 追求思想进步的两重性.....	275
二 主持全国的文博工作.....	296
三 未中断的文学活动.....	307
四 以身殉职的文化使节.....	315
附录：郑振铎年表（1898—1958）.....	322
后记.....	332

第一章 怎样走上人生的道路

(1898—1920)

1898年，中国政治舞台上演出了堪称近代史上最悲壮的一幕：当中国处于“三千余年、一大变局”的严峻时刻，在以康有为、梁启超和严复等一批率先感受了中西文化冲突，谋图通过宣传维新思想来拯救积贫积弱的祖国的先进中国人的鼓动下，深居在紫禁城里的光绪皇帝的心终于被打动了。是年六月，清廷颁布“明定国事”的诏书，决定变法，康有为和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由此参预朝政。然而，仅仅过了一百余天，昏庸残忍的慈禧太后在封建主义顽固派的支持和怂恿下发动政变，于是光绪帝被幽禁，康梁等人被迫流亡海外，谭嗣同等六君子则惨遭杀害——刚刚起步的“新政”由此废止。这就是说，中国人民在十九世纪末叶因外侮日迫而萌发的要求改革与进步，期待祖国民族振兴与腾飞的迫切愿望，活活地被封建主义政治淫威扼杀了。

但是，维新思潮的继续传播和日益发生影响，并没有也不可能因作为政治运动的“戊戌变法”的失败而偃旗息鼓。相反，随着近代中国政治社会局势愈加动荡，而一如既往地激励着那些当时尚未赶上参加戊戌维新运动的仁人志士们。这一年，谭嗣同等人的满腔热血洒在北京城的菜市口刑场的时候，陈独秀

已经十九岁、鲁迅已经十七岁、李大钊已经九岁、胡适已经七岁，而郭沫若、叶圣陶和茅盾也已经分别是六岁、四岁和三岁了。

也就是这个时候，在遥远的东海之滨，又有一个小生命呱呱坠地，来到了这个呼唤着叛逆的“精神界之战士”的世界上。他就是本书的传主——郑振铎。

一 家庭和身世

郑振铎出生于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戊戌）12月19日（农历十一月初七）。

和中国其他现代著名作家不同的是，郑振铎后来虽然也是著作等身，但他几乎没有好好地谈过自己的家庭身世，甚至连“履历表”式的简洁记述也没有留下，至多只是偶尔零星地提及两句。这样，翔实地介绍郑振铎的家庭身世以及少年时代的生活情况，就显得特别困难。根据我们目前能够寻见的传记资料，并参考其他研究者的调查考证材料^①，仅仅知道下列情况：

郑振铎的原籍是福建省长乐县，但他却出生于浙江省的温州城里，这是因为他的祖父（名不可考）年青时随一位在温州做“道台”的表亲当幕友，后来虽然曾被委派到一个海岛上做过海防小官吏，但还是把全家迁居到了温州。

郑振铎的祖父生有两个儿子和三个女儿。长子即郑振铎的父亲（名亦不知），次子郑莲蕃，郑振铎称之为三叔。由于当

^① 陈福康编著《郑振铎年谱》，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3月版。

时郑家在经济上并不宽裕，也可能有其他原因，小女儿在出生后不久，就被送给别人做养女了。

约在1905年前后，郑振铎的父亲去扬州当幕友，郑振铎随母亲郭宝娟（1880—1968）一同前往。谁知有一天，郑振铎的父亲意外地发现并打听了解到，当地知县的小妾竟然是自己那个早已送人的妹妹，由此感到莫大的耻辱和刺激，随即又发生神经错乱，不久只得由家里人把他接回温州。回温州后，他也很快就死去了。

在这种情况下，郑振铎的母亲自然也就回到了温州，又与郑振铎的祖父祖母住在一起。约在民国初年，祖父也去世了。这时，郑振铎一家的经济生活就陷于困顿，幸好郑振铎三叔莲蕃先生，早年赴西班牙留学，现已回国在北京政府外交部谋得“佾事”之职，全家就能够得到他的接济。不消说，这种生活毕竟是拮据、清苦的。由于当时家庭经济困难，郑振铎的母亲不得不经常做女红（刺瓯绣），以此贴补家用。在昏暗的油灯下，母亲弯着腰低着头，默默地用千针万线来攒一些使自己的爱子不至于受失学之苦的钱——这大概是少年时代生活留给郑振铎最深刻的印象。不然的话，为什么在他日后成名时，偶尔谈起自己的家庭身世，总是要道及这一点呢？

郑振铎原名木官，字警民，后来他在读中学时就以此为学名。再后，当他投身于新文化运动时，除了偶尔署用“木官”和“警民”外，则大都署名“郑振铎”，并以此行世。“振铎”两字典出《周礼·夏官·大司马》：“司马振铎，群吏作旗”（注曰：振铎以作众）。可以猜想，以此为名，大概是为了表达自己期望成为一位能够唤醒国人的启蒙主义者的决心。当时，郑振铎还署用“西谛”和“C·T”之名，它们其实都是“振铎”

两字的派生。因为，“振铎”两字的英文拼写以C、T这两个字母带头，而“西谛”则是C·T的音译。当然，因受时尚影响，同时又为现代中国的社会政治所迫，郑振铎在投身“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还署用了其他一些笔名和别号，如SC、子汶、YK、文基、西源、宾芬、郭源新、谷远、玄辛、何谦、长乐、玄览居士、幽芳居士、纫秋居士和陈敬夫等。其中，“郭源新”的名声和影响更大一些，因为郑振铎的不少著述单行本大都署用此名；而“纫秋居士”，主要是抗战期间在抢救民族文化典籍时署用；至于“陈敬夫”，则是他隐居在上海沦陷区时期的化名。解放后，郑振铎有时仍喜欢署用“西谛”或“郭源新”并且又另外起用了若干新笔名，如云纹、依知等。

我们认为，过细地考核和探究这些笔名和别号的谐音的微言大义，似乎没有太大的意义，知道郑振铎曾经署用过这些笔名和别号就够了。因为对于我们后一辈人来说，重要的在于认识和把握这位曾经署用了那么多笔名和别号的人，究竟是沿着怎样一条生活道路和思想演变的轨迹，走出他那个在旧中国属于很普通的家庭环境，由此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一位功绩卓著的先驱者的。

二 从温州到北京

郑振铎的少年学生时代是在温州度过的。

当时，温州虽然已是一个通商的港口，然而封建主义的社会秩序依然没有被打破。尤其对郑家这样的好歹也还算是个旧式士大夫家庭来说，尽管家道中落，但对于子孙生活道路的安

排，基本上还是沿袭旧时代的那一套。正因为如此，约在1907年前后，十来岁的郑振铎也就入私塾读书了。

私塾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是不难想见的。开蒙之后，主要是读“四书五经”。这样的课程，对于儿童来说，无疑是既艰深又枯燥无味的。然而，或许是由于长辈的督促，或许是因为自己好学，少年郑振铎却是读得相当用功，并且表现出了一定的学习创造性。据他后来回忆说：“余素喜治流略之学。童稚时，即手录《汉书艺文志》及《隋书经籍志》，时自省览。后得《八史经籍志》，乃大喜，类贫儿暴富”^①。可以认定，郑振铎深厚的国学根底，至少在这一时期打下了部分基础，或者说，郑振铎后来运用西洋近代的学术研究方法，从人类学和民俗学的角度来探讨中国远古时代的社会生活情况（具体表现为《汤祷篇》的写作），之所以能够那么娴熟地运用和解释有关典籍的材料，显然得益于这一时期的学习训练。

不过，中国封建社会末期旧教育所受到的自然冲击——尤其是“闲书”作为一种课外读物如同强大的磁力场吸引着每一个有着真正求知欲的学童的情况，在郑振铎身上更是得到鲜明的体现。在十三四岁时，他已开始接触了《聊斋志异》等书，又常常听长辈们讲民间故事和民间传说，由此对于中国古代文学——尤其是被他后来称之为“俗文学”的那些内容，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当时，他备了一本笔记本，或留下“灯前月下闻之于前辈长者的记载”，或自己动手“习写狐鬼之事”^②。应当说，文学种子就是这样在郑振铎心中萌芽的。而他日后以很大的兴趣和精力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以小说、戏曲等俗文学为

① 未刊残稿，参见陈福康编著《郑振铎年谱》。

② 郑振铎：《中国文学论集·序》，开明书店1934年版。

主)的研究,也在这个时候已铺下了第一块基石。

长辈们讲讲狐鬼故事,可能主要是出自无聊解闷。对于郑振铎,他们则是引导他学习旧体诗写作,因为尽管当时清廷已下命令废科举兴学堂、废八股改策论了,但吟诗填词仍是每一个欲进入上流社会的人所必须掌握的一种本领。唯其如此,郑振铎同时又“随长者们作诗钟”而“方解平仄”之后,他自己“亦喜赋咏物小词”了。可惜的是,他最初的一批诗歌习作,“随作随弃,也不复存稿”^①。但尽管如此,对郑振铎来说,这个时期,他又接受了一个方面的中国古代文学的训练。

武昌首义的枪声传到温州的时候,郑振铎虽然已是14岁的少年了,但可能由于温州远离当时几个政治中心的缘故,他对此并没有太激烈的反应,只是和其他人一样,闻讯光复便剪去了垂在脑袋后的那条已经长得颇为粗大的辫子。当时郑振铎进入了新式学堂的高小,并且拜识了一位使他受益很多,因而对之终生敬仰的老师——黄小泉先生。据郑振铎后来回忆说:黄小泉先生教学得法,不象别的国文教员那样“拖长了声音,板正了脸孔”,因而听他讲课“很感到趣味”,“我第一次有了一位不可怕而可爱的先生。这对于我爱读书的癖性的养成是很有关系的”^②。

1913年秋,16岁的郑振铎考入了温州城里的浙江省第十中学。整个中学期间,他虽然读过一些维新书刊,如《中国魂》和《新民丛报》之类,然而,思想变化并不明显,因为他当时

① 郑振铎:《中国文学论集·序》。

② 郑振铎:《记黄小泉先生》,《太白》创刊号,1934年9月。案:陈福康《郑振铎年谱》把郑振铎从黄小泉先生读书系年为1910年,似不确。据郑振铎在该文中说,当时是“高小第二年”,由此可以推知,时在1912年秋后。

最迷恋的仍然是《古诗源》、《文心雕龙》和《文史通义》一类中国文化典籍。例如，对于《文心雕龙》一书，他曾在一个暑假里向同学借来抄了一遍；当他发觉有同学买了本新刊印的《古今文综》后，也借来“日夜的看，并将其中有关‘文学批评’，即论文的部分，辑了出来，抄成《论文辑要》两册^①”。郑振铎似乎非常珍视这一最初的编辑工作，因而把这两册《论文辑要》抄本一直保存了下来。

总的来说，郑振铎在温州的学习生活是平淡的。他远没有后来也成了著名新文学家的同时代人那样，他的少年学生时代并不那么曲折生动，那么富有情趣，也那么过早地或明显地显示了深沉激进的精神风貌和大智大勇。如果联系到郑振铎后来的情况，至多可以认为，由于温州特殊的地理环境，朴实的少年郑振铎，这时还只是显露了具有扎实的学问根底和创造潜力的学者雏型，如果中国近代社会依然在死气沉沉中延续，如果郑振铎也一直生活在东海之滨，那么，他最终可能仅仅作为一个皓首穷经的旧学者走完自己的人生道路。

然而，时代要选择人，社会也会改塑人。真正使郑振铎在人生道路上发生重大转折的历史机遇，是在1917年夏天。当时，在很大程度上弘扬了戊戌维新思潮而又赋予许多新价值和新意义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已经拉开了序幕。20岁的郑振铎，可能主要出自于求学或谋生的考虑，以中学肄业的学历，离开温州途经上海来到了北京。

古老的北京城，是近代中国社会政治的主要舞台。19世纪中叶以来，紫禁城内外，不知上演了多少出令人感慨不已的活

^① 郑振铎：《中国文学研究·序》。

剧。就在郑振铎抵达北京前不久，“辫帅”张勋导演的拥戴清逊帝溥仪复辟的丑剧刚刚收场。当然，北京也是中国新思潮的策源地。郑振铎来到北京时，蔡元培正以兼容并蓄的立场态度主持着生气勃勃的北京大学校务，陈独秀则在北大任文科学长，同时主编《新青年》杂志。不久，担任北大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热情地向中国人民介绍着“布尔扎维克主义”。已在《新青年》上发表过《文学改良刍议》而打出文学革命发难信号的胡适，也到北京大学任教了。次年，鲁迅又正式投身于新文化运动，发出了振聋发聩的“救救孩子”的呐喊。至于北京的每一个高等学校，每一条大小胡同，更是聚集着一批喝着戊戌维新思潮的奶汁而成长的进步青年。例如，不久后成为郑振铎挚友的瞿秋白，也在这一年初春来到了北京；稍后成为文学研究会十二位发起者中的一半以上的人，此时也已闪耀于北京的各个角落。

北京城默默地迎接着郑振铎的到来。不过，郑振铎当时也还只是以一个普通的青年学生汇入北京市民的人流之中。而且，当时他的身上所折射的旧学之光还较为明显。例如，他在上海逗留时，曾喜孜孜地用两元钱买了一叠厚厚的线装书《九通》，并把它带到了北京。唯其如此，抵达北京之初，郑振铎在各方面都还显得稚嫩和孤寂。

当时，郑振铎寄住在位于北京东城根附近的西石槽胡同六号三叔家里。根据郑振铎本人的学业兴趣，他当然希望去报考文科院校，但在叔父看来，这需要一笔昂贵的学费，不如报考那些工科学校，不仅学费低廉（甚至享受公费），而且毕业后又有职业保障。显然，郑振铎服从了叔父的意见。这年冬天，他参加了北京政府交通部隶属的北京铁路管理学校的招生考试，

被录取后，从1918年1月5日开始，就分在该校高等科乙班（英文班）读书了。

在铁路管理学校读书之初，郑振铎象在浙江省第十中学求学时那样，仍然处处表现出一个刻苦学习的穷学生的形象。如他自己后来回忆所说：“我那时……有点象清教徒的样子，不抽烟，不喝酒，生活异常的刻苦，不论多远的路，总是步行，反对坐洋车，绝对的不穿绫着缎，不问冬夏，老是布长衫一袭”^①。据郑振铎的亲属回忆，所谓“布长衫一袭”，是指“有时冬天只有外面一件棉袍，里面贴身还穿着夏天的夏布褂衫”。然而，尽管读书用功，郑振铎对于专业课程又不太感兴趣，课余期间，主要是习史学，读古籍。如他自己所说：“在北京念书的时候，常托家叔莲蕃先生向外交部图书馆借些古书来看。刘知几的《史通》便曾花了整整一个暑假的工夫把它全部抄录下来”^②；有一次，“得见郑夹漈《通志二十略》，复手录其《校讎略》、《艺文略》”，“又假得章实斋《文史通义》，亦心服其论”，不过因当时“牵于治他学，于斯仅间一涉猎而已”^③。所谓“牵于治他学”，除了指专业课程外，看来主要是指外语，因为郑振铎所就读的那个英文班，各门课程大都用英语讲授，此外也设有日语课程。这样，郑振铎尽管一直没有培养起对铁路管理专业的兴趣，却也打下了外语（尤其是英语）的基础。到了1919年春，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俄国宣布放弃沙俄在中国的特权，中东铁路由此归还中国管理。鉴于当时中国铁路管理人员中乏通俄语者，北京政府交通部下令该校“高等科

① 郑振铎：《回忆早年的瞿秋白》，《文汇报》1949年7月8日。

② 郑振铎：《中国文学研究·序（初稿）》，转引自陈福康编著《郑振铎年谱》。

③ 未刊手稿，转引自陈福康编著《郑振铎年谱》。

乙班课程酌加俄文钟点”，并将“所授日文改授俄文”。这样，郑振铎在校期间也学习并初步掌握了俄语。

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郑振铎的稚嫩和孤寂开始渐渐地消退了，作为一颗壮实的种子，他已经有可能在北京这块肥沃的思想土壤上汲取特有的思想养料了。

三 置身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热潮中

在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新青年》前身）于上海创刊时，虽说住在温州的郑振铎“已是一个读者”，然而，他当然限于思想水平，还只是把它看作为一份“无殊于一般杂志用文言写作的提倡‘德智体’三育的青年读物”^①。自从来到北京后，感受就大不一样了。因为，他切实地受到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民主与科学”的精神的感染，从而也以一个坚定的追随者的姿态置身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热潮，其媒介物正是令他用新目光注视的《新青年》，以及那一批在《新青年》影响之下，在北京城里雨后春笋般地出现的宣扬“新思潮”的刊物。——而在1918年之后，这批刊物都已采用白话文体写作了。

郑振铎从小就有爱书藏书的癖好，求知欲又十分强烈。现在面对这些生气勃勃的新杂志，当然经不住诱惑，因而“每日日方出，便自东城根步行到西城上学。节省车资，购诸新刊物”^②。新刊物所宣扬的“新思潮”，把熟读了中国文化典籍的郑振

① 郑振铎：《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导言》。

② 郑振铎：《中国文学论集·序》。